

# 引 言

从清末开始国人自觉引入西方三段制学校观念并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学，至今已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如果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这一个世纪中国中学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大时期，即清末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前后各大约 50 年。其中前 50 年为中国中学教育建立和初步成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在当时剧烈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曾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学教育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关于这 50 年中学教育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虽已不少，但尚未有一本对这一时期中国中学教育发展全程进行综论的著作。另外，前 50 年中学教育中许多常被关注的问题，在后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学教育中仍继续被引出来讨论。如果在讨论中人们能够重视新中国成立前中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的积累并加以反思，从以往的改革经验中吸取智慧，则对认清中学教育问题的矛盾和症结，提高改革的有效性，应不无裨益。这些正是触发我尝试对这一阶段中学教育作一综合考察的基本动机。

## 一、研究对象、范围及其基本特征

和“中学教育”最为密切相关以至纠缠不清的概念可能要算“中等教育”。“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是以三级学制模式为基础而形成的概念，它是指位于初等和高等教育之间的中等程度的教育。

就“中学”一词使用的实际来说，通常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特指普通中学，其二是泛指全体中等学校。中国从清末建立近代学制之初，从事中等教育的学校就被分成三种类型，即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实业（职

业)学校。普通中学通常是指以加深普通知识、旨在为升学作准备而设计的一类中等学校。之后中等教育制度虽屡经变迁,但这种三分格局却基本延续未变,且无论在政府教育法规文件中,还是在学者的著述文字中,普通中学通常都被省称为中学。所以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之指称“普通中学”成为相沿成俗的习惯表达,与同层次的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有明确的区分。本文在使用“中学教育”一词时即采用这一历史涵义,并不因“中学”一词现实使用中的矛盾而发生歧义。所谓中学教育即是指普通中学教育,不包括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师范教育等。

本研究以普通中学教育为中心展开,不专门讨论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师范教育。作此选择,一方面是因为普通中学教育作为中等教育的主体,本身就足以成为、而且一直也是讨论整个中等教育问题的聚焦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师范教育常被作为专门研究领域,在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中也已得到足够重视,而普通中学教育的研究却相对薄弱。

但是中学教育又是一个需要适应广泛的社会需求、学生群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个人的智能结构都非常复杂的段位。清末民国中等教育虽分为普通、师范、职业三个部分,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三者之间结构与功能组合的矛盾交织,1922年学制还曾经提倡纳普通、职业、师范于一体的综合中学;即使在普通中学内部,也存在着专一升学预备还是升学和职业准备兼顾的长期争执。惟其如此,才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曲折多姿的一面。无论从目标还是功能上,普通中学教育都可以说是中等教育中弹性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一个方面,是整个中等教育统一体中的核心部分。中学教育是在与其他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获得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的,因此研究中也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中等教育而孤立地讨论中学教育,虽不专门讨论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师范教育的内部问题,但又不能不兼及普通中学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中等师范教育的关系。

以上从概念内涵上界定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下面再从时空等限域上对研究范围作进一步说明。从时间跨度而言,戊戌变法时期开始出

现国人自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学实体，以此作为研究的上限，下限断至 1949 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终结，着重于清末颁布学制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从空间限域和主导性质而言，本研究专注于中央政府统治区域的中学教育，亦即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统治下的中学教育。从实际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境内的中学教育还有教会中学教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中学教育、日伪占领区的中学教育等，这些中学教育各有其存在条件，暂不作为本研究的范围。

中学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改革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主题和具体领域。

就中学教育自身的特点来说，因其居于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中间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目标不似小学单纯，也不似大学确定，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更加条理纷繁。中学教育又以最易产生问题的青少年为受教育对象，他们生理、心理的半成熟状态，性意识的觉醒所引发的观念、情绪、行为等方面的问题，较小学和大学阶段的学生都明显得多，民国时期男女同校同学在小学、大学能够较顺利地实施而在中学则一直举棋不定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学教育还是反映社会、教育观念变化相对敏感的一个教育阶段，小学课程的重点如识字、数学等主要表现为工具性，内容的思想性、时代性并不太影响课程目标，体现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如西学）在小学反映不明显；大学对时代的反映主要体现在学术上；中学与社会文化、教育观念变迁中最为大众化的部分联系最为密切。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还是决定社会分层的一个关键阶段，小学教育作为国民基础教育，小学毕业也还不足以决定一个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而中学毕业则可以在社会上谋取适当的职业，并有机会成为各种基层事业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学教育的政策取向往往牵动千家万户，为众人瞩目。

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学教育，表现特别明显的是：一方面中学教育屡次成为改革的重点，另一方面与国人对中学教育所寄予的殷切希望相比，中学教育又成为教育实施中的薄弱环节。无论清末民初对学制的修正调整，1922 年的学制重建，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对学制的整理，几乎

每次中等教育都是重点。但从 1921 年孟禄来华考察教育时惊呼“中国教育，中学最坏！”<sup>①</sup>到 1931 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教育时，中等教育仍然被教育界认为是“中国国家教育之弱点”。<sup>②</sup>其故安在？

中学教育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发展的曲折历程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本研究不可能对各具体领域都细加探讨，但力求从整体上厘清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核心问题。

## 二、研究现状与问题

自清末制度化的中学出现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教育学者特别是中学教育理论工作者从未中断过对中学教育发展史的滚动式介绍和总结，这一势头在 1949 年后的台湾地区仍得以保持。在 1949 年后的大陆方面，改革开放前，近现代中国教育史研究多带政治批判色彩，难免偏颇。改革开放后，随着批判式研究方向的改变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力量向近现代转移，清末民国中学教育也常被作为连带或独立的研究主题。因此对本课题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在现有研究成果中吕达的《中国近代课程史论》，<sup>③</sup>熊明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sup>④</sup>对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问题均有较大篇幅的论述，前者专论课程，后者兼及课程与教学。归纳现有的研究，不足之处也相当明显，整体上主要存在如下两大问题：

第一，多为分散和局部性的研究，缺乏对清末民国中学教育发展全过程的综合和深入研究。现有成果或以单篇文章出现，或夹杂在一般研究成果之中，或局限于中学教育的某个时段的某个局部问题，总起来说，至今尚未见有一部对清末民国中学教育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专

《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新教育》第 4 卷第 4 期。

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国立编译馆 1932 年版 第 101 页。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初版，1999 年改名为《课程史论》由原出版社出版。

重庆出版社 1999 年出版。

著。与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甚至幼儿教育相比，中学教育史研究可谓是先天不足，查阅《民国时期总书目》未记录有一本中等教育史的著作，<sup>①</sup>而在高等、初等和幼儿教育方面则没有这种情况。一些作为其他成果附件而具有整体性研究形式的成果，又多为介绍而较少分析，尤其缺乏对中学教育内部诸问题和关系的深入研究。

第二，史料挖掘与整理还有很大不足。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资料的查阅整理确实存在不少困难，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民国关于中学教育方面的资料非常丰富，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卷登录的关于中等教育方面的书籍就达 1400 余种，<sup>②</sup>更不用说各种报章杂志和各种教科书了。卷帙如此浩繁，可以想见研究者挖掘、选择和整理的难度。其二，资料虽然丰富，但出于传本少、页面易损等一些其他原因，图书馆等收藏机构都采取了一定保护和封闭性的措施，如不准复印等，这无形中给研究条件并不优裕的中国大陆学者增加了取材的困难，降低了研究效率。尽管有上述困难，但是现有研究对一些基本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似亦嫌不足。明显的例子是，在民国时期出版发行的几份《中等教育》杂志，虽刊物存在的时间短，至今散失已非常严重，残缺不全，但显然属于研究民国中等教育时应该尽力搜寻的资料，而在大陆有关中学教育的研究中几乎无有提及，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门。

### 三、基本思路 and 结构框架

基于中学教育已有的研究成果强于局部而弱于整体的现状，本书采取系统研究与重点深入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对于研究较充分或较为人们熟知的方面从略，但为顾及问题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概略及之。在形式上力求构建一个能反映清末民国中学教育发展全程的整体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卷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

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卷 第 304—393 页。

性框架。在内容上侧重分析中学教育内部诸问题及相互关系，因为这是最具中学教育特色和目前研究较薄弱的方面。当然也不忽视中学教育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发展、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适应程度和互动关系的论述。

在结构框架方面，笔者曾试图打破教育史研究中较常采用的按时间分段推进的套路，完全采用按问题列纲列目的形式，以体现问题性，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但在实际操作时又倍感困难，这样论述主题虽然凸现出来了，但各主题之间因时间上的重叠，很难避免史实叙述重复和碎化人物思想观点的现象。思之再三，最后采用的结构形式是以制度、课程、训育、实施进展四个方面的问题领纲 布置各章 纲下各目则采用时间与问题结合的方式进行安排。

本研究力求在广泛的资料和观点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和归纳综合。清末民国时期已注意到教育的规划和统计工作，留下了不少与中学教育相关的数据材料，研究中对这些数据材料作了较全面的收集，采用基本的计量方法进行定量分析。

最后对各部分的主旨作一简要说明：引言部分旨在界定研究对象及范围，分析其基本特征，概述研究的现状和问题，并介绍本著述的基本设计。第一章分析清末民国中学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同时勾勒出制度发展的基本轮廓。第二章分析清末民国中学课程设置、实施的动态发展情况。第三章从学校监管和学生自治两方面考察清末民国中学训育的历史过程和效果。第四章从成长速度、区域差异、生源背景、性别比重等方面论述清末民国中学教育实施的进展情况。结语部分从清末民国中学教育发展的焦点问题出发，观照当今中学教育。

# 第一章 中学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学制是对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等方面的规定。<sup>①</sup> 根据上述关于学制的一般性概念, 中学制度所讨论的范围应主要包括普通中学的性质、任务、年限及分段情况等内部关系; 普通中学与中等教育的其他学校如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关系; 普通中学与大学、小学等的纵向衔接关系。本章即结合清末民国中学发展的实际, 对以上几方面作一基本的历史考察。

## 第一节 中学观念的引入与清末中学制度的建立

就办学实际而言, 我们在东西方各大古文明中都可以找到程度类似中等教育的实体, 但现代“中学”是一个相对于大学和小学的对待之词, 是三段制学校系统模式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 中外古代都没有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严格区分, 因而也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现代中学孕育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欧洲, 尔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展而影响于世界, 在清末作为三段制学制的连体一起移植于中国。

参考《教育大辞典》(1)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学校教育制度”条。

## 一、西方中学教育的演进

现代中学直接导源于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先是沿两条各不相同的路线发展，尔后逐渐沟通，最后形成现代中学制度的整体。

### （一）大学预备学校与下构型中学的产生

11 世纪的欧洲 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和演变 形成了一种自由讲学的风气。在一些大师的周围聚集了成批的学者，并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发挥研究所长，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团体。这种学术团体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学者组成，他们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行会的影响，为了保证自身的学术自由和利益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顺应时尚，结成类似行会的联合组织 欧洲的大学即由此发展而来 英语‘大学’（university）的拉丁语辞源即‘行会’（universitas）的意思。

大学的课程通常分为文、哲、法、医四科 其中文学科尤为其他各科的基础，而拉丁文作为当时欧洲的通用语言为讲学和著述所必备，因此学好拉丁文也就成了进入大学学习的必备条件。这样，一般青年在进入大学之前，要到欧洲当时比较发达的主教学校或僧院学校里学习拉丁文。这种情况促使这些学校的性质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大学的预备学校。这种学校一般成为封建贵族、高级僧侣等特权阶层的专利品。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城市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日益增强，对子弟受教育的要求提高。适应他们的需要，欧洲出现了一批同时注重知识传授和个性发展的新学校，如法国的学院（Collège）、德国的文法学校（Gymnasium）、英国的文法学校（Gram-

本目内容参考了以下资料：顾明远：《论中等教育的任务和结构》，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制度》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陈桂生：《教育原理》（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55—68 页 Paul Monroe,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Macmillan Company, 1914), Chapter II 王学孟：《中等教育的流变》，《教育通讯》复刊号第二卷（1946 年）第七期；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一五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9 年—1993 年陆续出版。

mar School) 等。这些学校除注重古典文科之外,还注重体育锻炼和礼仪训练等资产阶级生活所必需的修养和技能,较上述主教学校和僧院学校有很大不同。普遍认为这是教育史上出现的最早一批中学。

上述两类学校都不和小学衔接,只和大学衔接。入学对象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子弟,培养目标为进入大学深造作准备,学习年限较长。学生毕业后升入大学,或成为国家官吏。这些学校任务单纯,实际上就是大学的预备学校。它是在大学得到规范化发展之后,为适应大学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学校系统生成路线上属于下构型路径,故可称为下构型中学。

这一发展系统的中学在 17 世纪后随着中产阶级子弟的逐步加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注重现代实用学科和自然科学,以培养医学、法律等职业和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实科中学实科中学与注重拉丁语及古希腊文化的传统文科中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出现了唯实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峙。实科中学为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业留下了较宽的退路,在升学资格和程度上都被认为低于文科中学,一般也只能升入低于大学的技术学院。但是它作为高等教育的预备学校,服务于特殊阶层的性质和文科中学则无大的区别。中产阶级的子弟上中学志在升学,并不希望读完中学后马上就业。实科中学实际上是后来普通中学中理科组的源头。

## (二) 小学后续教育与上构型中学的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当局,也开设一些面向下层市民的初等学校,以便教授本国语的读、写和算术等基本知识技能,但为数极少。以大多数平民子弟为对象的小学,是在 16 世纪以后才比较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不断扩大。这主要受到三个方面力量的推动 第一方面是 15—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阅读上帝的福音,以便理智地参与教务活动。为了让平民大众起码能阅读翻译成国语的《圣经》就必须对他们施行识字教育 平民小学因此兴起。第二方面是在 18 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巨变，带来社会生活的迅速变化，生产对技能技术的要求提高了，平民对教育的需求也提高了。同时由于国家财富的积累，也给政府推进平民教育创造了物质条件。第三方面是 19 世纪以来民族观念和民主观念的增强，促使政府发展教育以培养国民的国家民族观念和民主意识。在以上几种力量一波接一波的推动下，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 19 世纪末基本普及了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并出现了将义务教育年限延伸到中等教育阶段的趋势。

平民子弟在受完小学教育之后，必然产生继续接受教育的要求。19 世纪中后期，通常是通过这样一些途径来满足这一要求的：第一是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增加高等小学（High School）。虽然学生在程度和年龄上与下构型中学的初期阶段相当（今天英语“High School”一词亦已表示“中学”了）但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 高等小学基本只在提高知识 内容贴近生活 如注重本国语而不是拉丁语 和公民训练 不作升学准备。第二是开设职业学校，进行生产技能的训练。第三是开办补习学校，让平民子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总之，平民子弟在受完小学教育之后，如果愿意和条件许可的话，可以选择接受一段小学后的继续教育，尽管这段教育在组织设施上大多还没有和小学教育划清界限，但其学龄和学业程度与上述“下构型中学”的初期阶段都有相当多的重叠 明显属于“中等教育”而两者的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相互平行各自独立。因它是在小学得到规范化发展之后，为适应平民的后续教育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学校系统生成路线上属于上构型路径 姑称之为“上构型中学”。

### （三）下构型中学与上构型中学的沟通

我们所说的下构型与上构型学校系统实际上是对学校规范化发展进程状态的一种描述 是就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中谁先规范化（社会化层面）而言的。在自然演进的教育发展进程中，规范化往往是制度化的基础。所谓下构型是由上向下逐渐规范化的学校系统发展方式；上构型是由下向上逐渐规范化的学校系统发展方式。在欧洲国家，学

校系统的形成大多是在自然发展中形成一定规范，再经人为作用（通常是国家立法、政府干预）而走向制度化的。

在平民小学兴起之前，欧洲下构型中学并没有发展起与其衔接的社会化小学，最多在其下位发展起了一些比较规范化的预备学校和预备班级。但就个体的成长来说，谁都必须经由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的过程，下构型系统中学生的初级教育基本是以非社会化的教育形式（如长辈辅导、家庭教师等形式）完成的，他们特殊的阶层地位也决定了他们拥有采用此类教育方式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学校系统发展路线也不是彻底的下构型路线，而是在与日益上伸发展的上构型系统进行沟通中完成的。不过欧洲若干国家是下构型系统发展在先，可以说他们的学校制度主要是沿下构型路线发展而来。

下构型中学和上构型中学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前者必须和上位教育目标配合，属预备性教育；后者不必配合上位教育目标，属完成性教育。前者是贵族路线；后者是平民路线。但是这种情况到 19 世纪末已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在课程上的变化，平民路线的学校也在准备升学了，我们以英国为例：

总而言之 在 19 世纪末年的时候，英国有两个平行的教育系统 起源既不相同 内容也不连贯：一方面是寄附的和私立的中等学校 所教育者为‘富裕阶级’的子弟 他方面是公立的初等学校 所教者为‘劳动的贫苦阶级’的子弟。这两类学校的分别 并非完全在其课程的性质和范围；因为大多数的中等学校的低年级都授小学功课。即如 19 世纪末年伦敦和别的大城市里有些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其课程的主要地方简直毫无区别，其学生的预备在于参与同样的公共考试 其物质上的设备也完全相同 可是二者的‘校风’和传统，一点也不相像 彼此隔着一道社会的鸿沟 遥然相对。<sup>①</sup>

<sup>①</sup> T. Percy Nunn 原著 傅任敢译：《英国中等教育之鸟瞰》《教育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六号。清末民国有多份名称相同的《教育杂志》 本文如不另外注明 所指均为上海 1909—1948 年间发行的《教育杂志》。

显然，在平民初等教育还不发达的年代，大学预备教育就只能为特殊阶层所独断。随着平民小学兴起，义务教育的实行，教育年限的后延，平民中的俊秀子弟也获得了在部分学术型课目上展示才智的机会。如果再将他们拒于大学校门之外，则不仅和日益增长的民主观念相违背，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形势下浪费了国家人才，所以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谋求两个系统的沟通不仅成为学制上需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各国都面临的教育实践中的难题。这种沟通主要发生在中等教育段位，所以中等教育是学校系统制度化发展过程中最难定型的一个学段。

各国沟通两种不同系统的方式各不相同。美国通常是在一所学校里设置性质不同、年限不同的科系，同时通过提供选修课程来满足不同个性和家庭背景的学生的合理要求。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美国这样民主观念浓厚，中学教育贵族化传统不强，中学教育发展迅速，有条件形成大规模中学的国家。在英国，20 世纪初则采取一种通过财政和行政的手段将小学与中学在 11 岁左右划开。即中央政府只对中学中 11 岁以上的学生实行计额补贴；中小学统归地方管辖，提供中学免费学额和优秀生奖学金，给小学生转入中学提供行政上的便当和经济上的优惠。<sup>①</sup>同时规定 11 岁考试，通过考试以决定学生流向何种中学，而新发展的中学与大学也衔接起来。

在下构型与上构型中学沟通的历史进程中，各国的中、小学之间学龄界限得以基本廓清，而两个平行系统的阶级界线越来越模糊了，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各国也都难免还保持着较深的传统遗存。

两条发展路径的沟通所带来的中学目标、功能、结构矛盾一直是以后中学发展中的问题。学校系统从两头向中间逐步规范化的过程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探讨的教育社会学问题，其中最深刻的大概是它所反映的社会民主化发展进程和阶层融合趋势。

<sup>①</sup> T. Percy Nunn 原著 傅任敢译：《英国中等教育之鸟瞰》，《教育杂志》第二十二卷第六号。

## 二、中学观念的引入及在清末的实践

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作为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本身不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自然演变，而是在西方文化教育观念的强行楔入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传统教育中很早就有‘小学’、‘大学’的观念，但没有‘中学’的说法。中学教育观念的引入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从明末开始一波三折的西学东传过程及其历史背景人们已耳熟能详，无庸赘述，这里仅选择介绍其中几个与中学教育相关的环节。

### （一）《职方外纪》的记载

16 世纪初欧亚航线开辟后，16 世纪末叶即开始不断有传教士随欧洲殖民主义船队来华活动。其中于 17 世纪初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方面起到了先声作用。1623 年他在其著作《职方外纪》中说：

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小学选学行之士为师，中学、大学又选学行最优之士为师，生徒多者至数万人。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岁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曰加（*logica* 即拉丁语逻辑学），译言辩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physica* 即自然科学），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 即形而上学），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即哲学）。学成，而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学数年而后成。学成，而师儒又严考问之。凡试士之法，师儒群集于上，生徒北面于下，一师问难毕，又轮一师，果能对答

如流，然后取中。<sup>①</sup>

这段文字首次向中国人概略地介绍了近代西方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教师资格、学习年限、课程构成、发展规模、考核方法等情况，清晰地展示了三级学制的轮廓。从课程和年龄上看，艾儒略所描述的中学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学的高级阶段，或大学预备阶段。这是笔者所见到的最早用汉文“中学”一词来指称中等程度学校概念。

早期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主要是传教，但附带介绍近代西学和西方的情况，这在当时是一扇中西文化交流、人民相互了解的主要窗口，但这些活动一直受到中国朝野的疑忌和议论。18世纪中叶，传教士的活动在中国遭到禁止，耶稣会在欧洲被解散，这扇半开半掩了近二百年的窗口终于在中西夹击下关闭了。一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又一次潮水般地涌向中国，但此时的中西态势已非一个世纪前可比了。

## （二）洋务运动时期传教士的介绍与改良派的设想

19世纪60年代，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和抗争之后，中华民族终于拉开了近代化改革的序幕，开始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时期，同时也启动了近代教育改革的进程。

如果比照后来建立的三段制学校制度，19世纪60至90年代举办的洋务学堂大多属于中等层次。但这些学校是在清政府还根本未意识到要对以科举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体制实施根本性转轨的情况下，应洋务活动对西学人才的急切需求而兴办起来的，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培养目标在于造就应各项洋务事业急需的专门人才，随主办者的需要而转移。在学业程度、课程设置、学习年限等方面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状态。洋务学堂在性质上属于提供专门训练的专科性学校，不注意传授近代基础西学知识的普通学校的建设是洋务办学的严重弱点。洋务办学的不足适足以从反面启发人们对建立近代学制的思考。

[意] 艾儒略原著 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页。引文中拉丁文夹注亦参照该书注释。

与此同时，在华活动的传教士也不失时机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学校制度和实施情况，并鼓励中国人仿效。从 18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传教士与此相关的主要中文著作有：花之安：《西国学校》（1873 年）、《德国学校论略》（1874 年）、《教化议》（1875 年）；艾约瑟：《泰西诸国校塾》；<sup>①</sup> 狄考文：《振兴学校论》；<sup>②</sup> 李提摩太：《救世教益》等。<sup>③</sup>

其中李提摩太在《救世教益》中介绍西方的三级学制模式时用了初学、中学、上学的概念。他写道：“西国近年皆重今学，其规条由初学内选上等者送入中学。迨中学学有进步，又由中学内选出众者送入上学。迨由上学内再选出众者则予以重赏。使之可以挟赏游历本国各处书院读书，并可以游历各国书院入其中以肆习焉。”

与传教士对西方学校教育的介绍相比，教会学校由一段制向两段制再向三段制推进的过程，无疑以更现实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三段制学制模式。1877 年在华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之后，基督教教会学校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不仅加速了教会学校的制度化发展，也扩大了办学规模。很多学校在小学的基础上办起了中学，尔后又陆续发展起了大学班级，最早在中国境内建立了正规化的三段制学校实体。<sup>⑤</sup>

传教士的办学言行和洋务学堂的不足，促进早期改良派人士不断提出建立近代学制的构想，设计了各不相同的学制方案。其中较早勾画出包含“中学”在内的三段制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于 1884 年就提出“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建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的构想，“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省府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大、中、小学均采用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

《万国公报》光绪六年（1880 年）二月。

② 《万国公报》光绪七年（1881 年）闰七月。

连载于《万国公报》光绪十六年（1890 年）至光绪十八年（1892 年）启册。

钱钟书：《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18—119 页。

参考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9

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即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郑观应设想的这个三级学制系统，实际上是以中等教育作为正规学制的起点的，学制中的“小学”已不再是启蒙教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中学”实际相当于今天中学的高级阶段。而“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相当于初等教育的启蒙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不规定学习年限，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按照这种设计，初等教育阶段实际上是非制度化或多轨性质的。<sup>①</sup>

### （三）南洋公学——国人对三段制模式学校的最早实践

中日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兴起，改革教育、培养人才被认为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早期改良派的学制改革思想开始落实于个别办学事例，而在这方面的先行者就是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呈请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开办中西学堂，亦称北洋西学堂。天津中西学堂分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两段，并各分四班（相当于今天的四个年级）学制各为4年，共8年。其中二等学堂是头等学堂的预备学校，入学时的年龄“自十三岁至十五岁止”并须经过考核，只有“读过《四书》并通一二经文理稍顺者”才有入学资格。可见尽管《章程》中声明“二等学堂即外国所称小学堂”，<sup>②</sup>但无疑具有中学的程度，而头等学堂约相当于大专程度。

盛宣怀又于第二年奏请在上海设立南洋公学，并于1897年正式开办，先后设立四院，其中师范院（1897）相当于师范学堂，其余外院（1897）、中院（1898）、上院（1900）大略分别相当于小学、中学、大学，中院年限为四年。三级相互衔接，依次递升，具有近代三级学制的雏形，

郑观应：《考试下》 据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77—78 页。

《天津中西学堂二等学堂章程》，朱有 璈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497 页

可以说是三段制办学模式在中国的最早实践。南洋公学中院于 1898 年春设立,<sup>①</sup>这应该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名实相符的中学。南洋公学外院的学生也不能和一般的小学生相提并论,1897 年秋招收 120 名学生,入学时年长者已十七八岁,幼者十二三岁,“国文因受过家庭的训练程度大都已楚楚可观,所缺的是时务上的学科。”<sup>②</sup>有的学生只读了一年就升入了中院(中院因此设立),1899 年夏合格者全升了中院,不合格者另行进修后也于这年冬升入了中院,所以外院只办了两年多就停办了,<sup>③</sup>到 1901 年春才又设立了代替外院的附属小学。<sup>④</sup>

在清末颁布学制前,南洋公学的办学实际以中院为主体,外院和上院实施并不完全,这也是教育改革年代新旧交替的通常现象,但整体上三段制形式的轮廓无论在规划上还是在实施中都清晰可见。南洋公学的办学实践形式,也可被视为三段制学校模式在中国近代由观念向制度过渡的实体中介。

### 三、中学制度的建立

#### (一) 维新前奏

维新运动期间,建立近代学校制度已成为有识之士一致的呼声,1896 年 6 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呈折奏请推广学校,请求设立京师大学、省学、府州县学,受到光绪皇帝的重视,即交总理衙门议复。尽管有关方面已就建立京师大学堂拟定了实施意见,但终因守旧派的反对而搁置。这份后来以《请推广学校折》<sup>⑤</sup>之名传世的奏章,被认为是清末建

《南洋公学大事记》,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第 524 页。

《石某记南洋公学学生生活》,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第 547 页。

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第 527 页。

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第 529 页。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62—69 页 亦载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 第 484—488 页